

## 戰時體制下的兩岸貿易（1941-1945）

許世融

### 摘要

舊志關於臺閩貿易的記載曾提及，由於日本對中國全面侵略，使得全部商事乃隨戰火爆發而告斷絕，遂令後來學者誤認中日戰爭爆發後，兩岸貿易全面中斷。本文發現戰爭時期的兩岸貿易，雖有1937年下半期的短暫下挫，但從翌年起再度增加，1941年達到14,000萬圓的高峰，為1937年的三倍。

造成本時期兩岸貿易額大幅增加的原因，是日本在軍事侵略時，也在經濟上將日、臺與對岸中國同納入「圓域貿易圈」。為因應戰爭需求，1932年先整編關東州和滿洲國，形成「日滿集團」；1930年代末期再將中國本土各地陸續納入，形成「日滿中集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進一步擴大為「大東亞共榮圈」，於是臺灣與對岸貿易形同國內通商，大幅降低關稅的衝擊。

但即使如此，兩岸貿易仍須受制於日本帝國本身的貿易統制策略。大致上，戰爭初期為避免對「圓域」過度輸出，阻礙外幣取得，導致入超過出，所以對圓域圈內貿易採取抑制手段；待「戰時體制」確立，對圓域圈內的貿易轉趨積極，遂使兩岸貿易以超乎前此的速度成長。

關鍵詞：兩岸貿易、圓域貿易圈、戰時體制。

## Trad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under War-time System (1941-1945)

Shih-rong Hsu<sup>\*</sup>

### Abstract

It is recorded in history that the trade links between Taiwan and Fujian had been broken since 1937 when the Japanese started to invade China. This concept has lead many scholars to believe that the trade across the Strait had come to a halt between 1937 and 1945. In this study, we discover that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had increased continually during the wartime period despite a brief setback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37. It actually started to rise in the following year and reached a total of 14,000 million Japanese yen in 1941, an amount three times of that of 1937.

The trade increased largely due to the economic measures taken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uring her military aggression to China. The Japanese had formed a big Trade Circle to include Japa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First in 1932 a trade link between Kwanto state and Manchuria was made, forming the Japan-Manchuria Trade Group.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of the 1930s, the link expanded to other parts of China, forming an even greater circle of trade area among Japan, China, and Manchuria. And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Pacific War, the circle widened to the Big Asia Circl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became virtually an internal one, and tariff duties were greatly lowered.

Even so, trad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ere still largely restricted by the Japanese Empire's economic strategies. Generally speak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in order to avoid trade deficits, many restrictions were set up to limit over-exporting to the Big Circle. But after the War Time System was set up, the trade within the Circle rapidly grew.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戰時體制下的兩岸貿易（1941-1945）

**Keywords:** The Big Circle Trade Area, War-time System,  
Trad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國史館館刊 第25期

## 戰時體制下的兩岸貿易（1941-1945）<sup>\*</sup>

許世融<sup>\*\*</sup>

### 一、前言

以往有學者認為，由於日本發動對華侵略，遂使得兩岸的商事貿易隨戰火爆發而完全斷絕。<sup>1</sup>傳統的歷史研究，對汪精衛政權下的兩岸互動歷史常有所忽略，連帶地也較少注意「圓域貿易圈」在中日戰爭時期的型塑。「圓域貿易圈」，指的是日本以日圓集團為中心所構築的亞洲經濟貿易體系。隨著「圓域貿易圈」的編成，日本帝國透過其所扶植的傀儡政權，掌握了全中國80%以上的收納關稅區域，於是臺灣與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地，皆恢復實質貿易往來；藉由日本在戰時所執行的貿易統制政策，兩岸間的貿易其實是不斷在加強之中，特別是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遭到歐美國家的經濟封鎖，反而強化了「圓域貿易圈」內的貿易進行，使得兩岸間的貿易往來更加緊密。

本文的目的，試圖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所留下的統計資料，以及當時相關人員的論著，來探究日本在大東亞戰爭期間逐步建構戰時貿易體制的過程，以及在不同的戰爭時程與要求下，此貿易體制的運作實況，進而瞭解1941年至1945年間臺灣與中國大陸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情形。文中的大陸地區，包含滿洲國、關東州以及華中、華北先後成立的所謂「偽政權」，至於此時仍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以及與日本經濟絕交的重慶政府則不在討論之列。章節的安排，除前言、結論外，正文

---

\* 本文承蒙國史館林滿紅館長暨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0年2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6月4日。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1 林滿紅，〈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日本領臺為兩岸長程關係投下的變數〉，收入於氏著，《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1刷），頁318-9。該文所引據為《臺灣省通志》的說法，而《通志》則僅就臺灣與福建的貿易加以論述，詳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59年6月），第4卷—經濟志·商業篇，頁163。

計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先討論影響本時期兩岸貿易發展的根本動因——圓域貿易圈，特別是中國部分的編成經過；第二部分進一步探究日本在戰爭期間對圓域貿易圈的貿易統制政策；第三部分則試圖描繪出在圓域體系下兩岸貿易的發展狀況，以及所展現出異於前此的面貌。

## 二、圓域貿易圈的編成<sup>2</sup>

圓域貿易圈的編成，與日本在本國及其殖民地的貨幣使用習慣關係密切。日本把各殖民地約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樺太及南洋群島，完全使用內地發行的日本銀行券（日圓）；第二種為朝鮮及臺灣，適用內地貨幣法，且藉由殖民地中央銀行發行只在殖民地專用的日圓，同時日本透過所謂「圓匯兌本位制」，確保內地「圓」與殖民地「圓」等值；第三種為準殖民地關東州、滿鐵附屬地及滿洲，先維持銀本位，但最後使其貨幣面值亦與日圓等值。<sup>3</sup>

一言以蔽之，日本殖民地通貨政策的特徵，是澈底扶植殖民地「圓」的成長，並擴大以內地為核心的「圓通貨圈」。這樣的特徵，使得日本得以在1930年代的集團經濟趨勢中，與英、美等國分庭抗禮，並在中日戰爭開戰後，將「圓通貨圈」強行編成「圓域貿易圈」，進而納入中國占領區，逐步往「大東亞共榮圈」的方向邁進，為遭到其他集團抵制的日本帝國提供經濟上的奧援。本節擬先針對圓域貿易圈的意涵、形成經過，特別是如何利用關稅及貨幣政策將中國占領區納編的過程加以說明。

### （一）圓域的定義與編成

「圓域」或寫做「圓ブロック（bloc）」，意即「日圓集團」。「ブロック經

2 圓域貿易圈的出現，雖較本文所欲討論的時間斷限為早，但由於圓域貿易圈始終存在於日治後期的兩岸貿易環境中，因此並不能視為時間以外的內容；再者，多數非研究本時期貿易者對此圓域圈的概念並不清楚，若未詳加解釋，恐難以鋪陳其後的貿易發展動因，因此本文擬先從圓域貿易圈形成背景討論起。

3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2月初版第1刷），頁103-105。

濟」（集團經濟）一詞與概念產生於1930年代，<sup>4</sup>由於經濟大恐慌的發生，使得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遭遇空前的挑戰，世界經濟出現集團化的傾向：1930年美國制定新關稅法，開啟了國際關稅戰爭；1932年英國召開渥太華會議，以英帝國領域內的特惠關稅制度為主軸，形成排他的「英鎊集團」經濟圈。「英鎊集團」的形成，遂成了促使日本、德國各自建構獨立經濟集團的契機，此後世界被分割為數個集團，無法再維持圓融的貿易關係。<sup>5</sup>這種新經濟型態的特點，是以本國及其殖民地為一個集團，以關稅壁壘與貿易統制為手段，將殖民地當成是本國產業的獨占市場及原料供應地。<sup>6</sup>

關稅及貨幣是日本塑造圓域貿易圈的最重要工具，至於其形成過程，則有時間先後，南樺太、南洋群島、臺灣及朝鮮是圓域的最初舞臺。南樺太由於規模不大，遂省略殖民地幣制的創設，而以日圓為唯一法幣，且貿易統計合併在內地當中；臺灣及朝鮮各有扮演殖民地中央銀行角色的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分別以「臺灣銀行券」及「朝鮮銀行券」為法幣，惟兩者皆以「圓」為基本單位，對「日本銀行券」保證用1:1的固定匯率自由交換，遂與內地通貨強力結合；再者，兩地彼此間及其與內地間的貨物移出入不課徵輸出入稅，乃形成與對外貿易有所區別的內國貿易圈；南洋群島在1915年頒布「南洋群島貨幣令」，通用日本法幣，而當地移出入貨物原則上並不課稅，經濟制度的內地性十足強烈。至於1905年取得的關東州在經濟關係上則呈現極為濃厚的外地性色彩，當地係採行「複數通貨制」，原則上以「朝鮮銀行券」作為法幣及交易價值的基準，但滿洲乃至關內中國的通貨也同時流通，在日本貿易統計上，當地向來被視為外國。<sup>7</sup>

1932年滿洲國成立而有「日滿經濟統合」。1933年4月，滿洲國進行幣制改革，從以往的金單位及海關兩改為以滿洲國幣「元」（即滿洲中央銀行券）為基本貨幣單位，形成單一貨幣圈。最初是以銀為本位發行，1935年為了實現「日滿通貨

4 林益謙，〈轉換期臺灣的新出路〉，《臺灣時報》，第236號（昭和14年7月），頁3。

5 武田晴人，〈現代日本經濟史12〉，收入於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經濟學部網站，網址：<http://www.e.u-tokyo.ac.jp/~takeda/gyoseki/GAKU00-12.htm>。

6 三浦弘一，〈臺滿經濟提攜の基調と方向〉，《臺灣時報》，第235號（昭和14年6月），頁30。

7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頁119-120。

連結」，遂轉換為金本位制，貫徹國幣「元」對日「圓」的等值交換，從此大大強化了所謂日滿「圓」集團的結合，惟考慮到滿洲國的財政狀況，關稅面的「日滿同化」稍有遲延。<sup>8</sup>

1937年以後，中國各地陸續進入日本的支配範圍，開始出現將滿、中合併，以日、滿、中一體為經濟政策。<sup>9</sup>廣田內閣（1936.3-1937.2）成立後，由於軍事費用持續擴張，使得輸入激增，從1936年秋天起，日本遭逢急速的國際收支惡化，不得不實施更為嚴格的經濟統制，於是藉由中日戰爭的契機，逐步朝向包含中國本土在內的「日滿中集團」發展。<sup>10</sup>關於這個集團，日本政府宣稱是「日、滿、中各以其地理條件為基礎，在互助關聯的關係下，以共存共榮為原則而結合，與歐美各國以本國利益為本位的性質全然不同」。同時，滿洲國及「中華民國」（指維新政府或汪政權）仍維持表面上的獨立，因此日本遂強調圓域經濟體是一種「經濟協同體」，各個國家相互尊重，隨著地理條件合理的展開有無相通的關係；其最終目的則是建設一個以日、滿、中為樞軸的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sup>11</sup>

進入1940年後，日本甚至提出建設包含南方各地區在內的「大東亞共榮圈」。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與英、美關係正式決裂，乃進一步占領歐美各國在東南亞各地的殖民地，遂將圓域貿易圈擴展到了極致。<sup>12</sup>

總結上述，圓域貿易圈可說是日本透過關稅與通貨的統合，歷經四個階段的經營、擴大而成型。同時，在每個階段皆有不同的名稱與涵蓋區域：最初階段的範圍只限於日本和南樺太、南洋群島、臺灣、朝鮮等殖民地，且無特定名稱；第二階段

8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頁76、148。

9 太田修吉，〈事變と臺灣對内外貿易の現狀及將來〉，《臺灣時報》，第221號（昭和13年4月），頁68。

10 武田晴人，〈現代日本經濟史12〉。

11 三浦弘一，〈臺滿經濟提攜の基調と方向〉，《臺灣時報》，第235號（昭和14年6月），頁30-1。

12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圓域貿易圈」由原本僅有四個貿易單位的「日滿中集團」擴展為十一個貿易統計單位的「大東亞共榮圈」，此十一個貿易統計單位包括：滿洲國、關東州、中華民國、香港、澳門、英領馬來、蘭印、緬甸、法印、菲律賓、泰國，見田淵實，〈臺灣貿易の構成變化〉，收入於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昭和16年版7月2刷）（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頁608。



在1930年代加入中國東北，稱為「日滿集團」；1937年以後進到第三階段，逐步納入中國各地，形成日滿中集團，圓域貿易圈至此可謂定型；最後在1940年後更擴大發展為涵蓋東南亞在內的大東亞共榮圈。其中第三階段日滿中集團的形成，攸關戰爭期間兩岸貿易的發展，故本文接著要探討日本運用關稅及通貨將中國占領區編入圓域貿易圈的過程。

## （二）圓域體制下的中國海關與關稅政策

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延續侵略滿洲、華北時所採取的以華制華政策，極力在中國扶持傀儡政權。<sup>13</sup>作為國家主權象徵的海關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其染指的目標，這使得中國在1930年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稅自主權遭到嚴厲考驗。不過有鑒於中國海關的國際性格，並擔負清償外債與賠款任務，因而日本採取三個步驟逐步掌控中國占領區海關：首先插手稅款保管權；繼而操縱傀儡政權修改稅則；最後則大量安插日籍關員，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全面進占海關。<sup>14</sup>

### 1. 稅款保管權之爭與英日協定

日本之所以急於搶奪海關稅款管理權，一來是為了控制國民政府的財政；二來則是留做侵略中國的軍事經費。<sup>15</sup>第一個覬覦的目標是1934年以來，國民政府在華北地區僅有的主權象徵——津海關和秦皇島海關。1937年日軍進占華北後，津海關

13 日本初於1937年10月29日在察、綏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以內蒙的德王為首；繼於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臨時政府，由湯爾和、王克敏、王揖唐、齊燮元等組成，統治河北、察哈爾、綏遠、河南、山西五省；旋又於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維新」政府，由梁鴻志、溫宗堯、陳錦濤等組成，統治江蘇、浙江、安徽；最後則積極與國民政府內部的妥協派接觸，成功的促使其分裂，於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另立以汪精衛為首的中央政府，同時合併了北平的王克敏和南京的梁鴻志政權。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82年10月第4版），頁628-631。

14 有關中國納入圓域圈的過程，主要是利用關稅與貨幣的手段，這兩者所象徵的正是國家主權的角力，因而筆者希望利用外交檔案來了解此過程，惟原先國內近史所檔案館所藏外交檔案僅到1920年代，其後的資料直到最近才由外交部移交，在使用上尚不方便，故以下有關此兩部分的討論，主要是利用中國出版，由陳翰笙、千家駒主編的《一九三八年英日關於中國海關的非法協定》（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該書係從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與英國大使館往來的機密文件中選譯，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此外並盡量參酌其他相關著作，如貨幣方面，便多方參考國內中研院近史所林美莉女士的著作。為免行文冗長，以下提及該書時，一律簡稱《非法協定》。

15 蔡渭洲，《中國海關簡史》（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版），頁156。

稅務司梅惟亮（W. R. Myers）即建議採取妥協方針以保全總稅務司署統轄下的海關，具體做法則是將津、秦兩關稅款全部扣留，暫不匯解，以換取日本放棄接收兩關的行政權，<sup>16</sup>迫於形勢，國民政府只得交由梅惟亮與日本總領事談判。<sup>17</sup>國民政府提議將海關全部稅款由中央銀行委託中、日以外的第三國銀行暫存，不過日方強烈反對，揚言除非同意將兩關稅款存入正金銀行，否則無妥協餘地。<sup>18</sup>眼見無力回天，國民政府只得「非正式特准該稅務司得自由斟酌」。<sup>19</sup>10月22日，梅惟亮在天津正金銀行開立帳戶，其後津、秦兩關的全部關稅，包含進口稅、進口附加稅、出口稅、出口附加稅、復進口半稅、復進口半稅附加稅在內，皆存入該行稅務司帳戶中。<sup>20</sup>

同年11月日軍占領上海後，向江海關稅務司提出仿照津、秦二關前例，將稅款存入日本銀行的要求。<sup>21</sup>由於上海是中國最大口岸，稅收最多，國際關係遠較津、秦二關複雜，日方要求隨即引發相關國家的嚴重關切，故日本深知欲達目的，勢必與英、法、美等國展開談判。

列強中介入最深的國家，首推英國，其態度甚為明顯，即不惜犧牲中國海關權益，以保全自身利益——包括對淪陷區海關的統治以及償賠等款項的償還，即使中國政府反對，也務必強迫其接受談判結果。<sup>22</sup>英國先由駐日大使克萊琪（R.Carigie）造訪日本外相，取得談判期間不以武力奪取海關的承諾；<sup>23</sup>繼而與

16 「1937年8月11日梅樂和致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關務署第321號代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2。

17 「1937年10月14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372號代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1-12。

18 「1937年10月17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375號代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4。

19 「1937年10月19日梅樂和致梅惟亮第678號電原譯文」，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6。

20 「1937年10月22日梅惟亮致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堀內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6。

21 「1937年11月19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402號代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50。

22 「1937年11月20日英國外交部致英國駐華大使館第485號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50。

23 「1937年11月28日克萊琪致英國外交部第729號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

美、法合謀對策，由英國外交部指示駐華和駐日使館分別在上海和東京與日本談判。上海的談判由於總稅務司梅樂和以有關列強反對為由，提議由當地日本當局直接與相關國家接洽，如有結果，且不為中國政府所反對，海關樂於合作。在他的強硬態度下，談判呈現膠著狀態，於是重心逐漸移到東京。<sup>24</sup>

英、美等國雖不願日本奪取他們在東方的利益，但因忙於應付希特勒，所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對日本極力採取妥協態度。東京談判集中在稅款保管、債賠的償付以及攤還外債所使用的貨幣上，到1938年4月下旬，雙方達成數項協議：將日本占領區各海關稅收以總稅務司名義存入正金銀行或雙方同意的銀行、償還債賠各款為關稅首要開支、各關應攤外債分額按所占稅收總額比例逐月核定、1937年9月起停付日本的庚子賠款應即給付日本政府、以中國法幣支付攤還外債等。<sup>25</sup>至此，英、日私下協議正式完成，日本得到海關的實際控制權，而英、美各國也保住債賠各款持續償還。

國民政府的態度頗為舉棋不定，談判之初，堅不讓步；<sup>26</sup>待見到國際介入，財政部隨即要求梅樂和提出反建議：「由兩家或兩家以上的銀行，其中一家為正金銀行，組成保管委員會共同保管淪陷區的全部關稅」。<sup>27</sup>等到英日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財政部為了避免承擔贊成或破壞協定的責任，並未明確表示態度。<sup>28</sup>惟鑒於中國民眾憤怒的情緒高漲，不得不對協定的簽訂提出異議，並凍結前此的兩筆款項。<sup>29</sup>儘管如此，但此後日本即將占領區的關稅收入存入正金銀行。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占領華南前夕，梅樂和甚至事先致函華南各關稅務司，預告日本將會要

51-52。

24 「1938年2月11日梅樂和致賀武第11684號函」、「1938年2月11日賀武致梅樂和函」、「1938年2月11日那琪安致梅樂和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72-74。

25 「1938年5月2日日本外務相廣田弘毅致克萊琪第59/A1號照會」，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98-99。

26 「1938年1月26日關務署致梅樂和代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60。

27 「1938年2月3日孔祥熙致梅樂和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66。

28 「1938年5月4日安斯邇致梅樂和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03。

29 兩筆款項分別為1937年9月起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賠款525,000鎊，以及積存匯豐銀行的稅款26,700,000元。見「1939年1月29日梅樂和致寇爾、高斯和法國駐華大使館參贊諾貝爾（F. Knobel）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41。

求將稅款存入當地正金銀行分行，稅務司在脅迫下，最後都不得不同意照辦。<sup>30</sup>至1939年7月20日為止，全國海關稅收的87%是淪陷區口岸徵收的，也就是重慶政府只得到其餘13%。<sup>31</sup>

## 2. 淪陷區的稅則修訂

日方成功劫奪津、秦兩關稅款後，接著便唆使華北政權進行稅則修訂。當時海關統一實行的是1934年的稅則，津海關則打算以稅率最低，且對日本進口最有利的1931年稅則為藍本進行修改。1937年12月下旬，津海關監督溫世珍向梅樂和預告，由於日本方面的催促，翌年的1月1日將發布命令，修改稅則五十個項目，並大幅減低出口稅，甚至鄭重考慮取消全部出口稅和轉口稅。<sup>32</sup>其後由於北京臨時政府主席王克敏和日本軍方關係不洽，與新任海關監督溫世珍又復不合；且王不同意日方對某些項目減稅的要求，使得原訂實施的稅則，遲至1938年1月22日始正式公布，津、秦兩關分別從22日及24日起施行新稅則。<sup>33</sup>本稅則規定出口稅以從價2.5%為原則，棉花出口暫時免稅；進口人造絲每噸改徵31金單位；開礦機器、冶鍊機器、農業用種子免稅；電機及燈泡從價25%。<sup>34</sup>

財政部得知後，隨即電告梅樂和，要其轉達津、秦各海關稅務司拒絕施行。<sup>35</sup>但此時梅樂和卻建議財政部批准將1931年稅則稍作修改後恢復實施，這樣既可抵銷華北淪陷區擅自修改稅則，又可以保證各國商人享受同等待遇；並警告如果政府拒絕，原從上海等地進口的貨物將從天津和青島進口，並通過鐵路和公路滲入淪陷區，使政府的威信和稅收受到損害。<sup>36</sup>當時國際間受到希特勒勢力的牽制，並未強

30 「1938年10月21日梅樂和致華南各關稅務司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36-37。

31 「1939年7月20日梅樂和致高斯函」，附件1「1939年7月20日梅樂和致高斯備忘錄」，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76。

32 「1937年11月10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396號代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25。

33 「1938年1月18日阿弗萊致英國駐華大使館電」、「1938年1月31日阿弗萊致英國駐華大使館電」、「1938年2月1日梅樂和致賀武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33、38。

34 「1938年1月24日梅樂和致孔祥熙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34-35。

35 「1938年1月23日財政部致梅樂和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34。

36 1月18日，阿弗萊致英國駐華大使館的電文提到：「在稅則問題上，最好中央政府能趁此機會主



力介入此事，<sup>37</sup>所以財政部雖然否決梅樂和的提議，卻也拿不出更好的對策，只能要求他轉知各地稅務司拒絕實施「偽稅則」，並聲明「凡按偽稅則繳納的關稅，中國政府概不承認」。<sup>38</sup>到了3月初，國民政府迫於形勢，不得不請英國駐華大使代為轉達給梅樂和的指示：「在未接到英國政府的答覆以前，請命令各關稅務司，偽稅則實施範圍不得擴大，已實施偽稅則的各關應儘可能恢復合法稅則」。<sup>39</sup>梅樂和也隨即轉發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各關稅務司。<sup>40</sup>換言之，國民政府無疑已默認北京政權制定的新稅則在上述四關施行。

5月底，新成立不久的「維新政府」，派遣江海關監督李建南至江海關面交臨時政府公布的1938年進口稅則及出口稅則中改訂之項目數則，並轉達該政府命令，飭江海關將該項稅則於6月1日施行。由於此項稅則也是以1931年的稅率改訂，<sup>41</sup>等於是將華北新稅率推行到華中淪陷區各口岸。1940年汪政權成立後，雖有提高關稅率之意，並希望日方協助，但日方態度不甚積極，所以只流於紙上談兵。<sup>42</sup>

### 3.全面進占中國海關

日本對淪陷區海關的劫奪，大略可以1941年底的太平洋戰爭劃分為兩個階段。

動地恢復1931年稅則，爽爽快快地減低一些出口稅率，在目前來說，這一措施一定會鼓勵貿易，增加稅收償付外債，而且先下手為強，還可以使日本陷於被動。實施一個大大減低的稅則，特別是以出口稅為重點，不論由誰下令實施，一定會迅速解除許多困難，大受歡迎。」可見梅樂和的建議，與英國駐華外交官的看法如出一轍，明顯是站在英國商人的立場，而非真正為中國海關計。見「1938年1月25日梅樂和致孔祥熙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34-35。

37 英國方面，駐華代辦賀武（R.G.Howe）雖以地方政權無權擅自修改稅則為由，向華北日本當局提出抗議，但也一面勸告國民政府財政部接納梅樂和有關施行1931年稅則的建議；至於美國國務院則表示「無意提出意見」。詳見「1938年1月28日賀武致梅樂和函」、「1938年2月10日高斯致梅樂和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37、41。

38 「1938年2月16日梅樂和致梅惟亮電稿」，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43。

39 「1938年3月2日英國駐華大使寇爾（A. C. Kerr）致梅樂和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44。

40 「1938年3月4日梅樂和致寇爾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46。

41 「1938年6月2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505號代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14-5。

42 汪政權財政部長周佛海曾在1940年11月4日、1941年10月29日、12月19日分別提到「研究提高關稅稅率」、「明年擬舉辦油類、糖類及化妝品類特稅，及徵收海關附加稅，希望日方協助」、「接見新任總稅務司岸本廣吉，談整頓關務及增加關稅問題」等語，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2003年第1版），頁374、533。

前期是委派親日的海關監督插手海關行政，強迫執行各種親日政策，實現對海關的間接統治，同時不斷安插日籍人員進入海關，將名義上仍隸屬於中國政府的海關，變成統治中國的工具；後期既與列強公然決裂，乃以武力占領淪陷區各海關。<sup>43</sup>

1937年11月，日本宣布將國民政府任命的津、秦兩海關監督免職，改由溫世珍兼任。12月北平王克敏政權成立後，為了逼迫津海關承認，遂由曾服務中國海關之日籍關員松原梅太郎，聚集多位滿洲國海關關員在津預備接收海關，稅務司梅惟亮被迫對新政府予以事實上的承認，並掛起了五色旗。<sup>44</sup>1938年5月英協定簽署後，日本進一步慫恿維新政府接管江海關，5月6日維新政府新任江海關監督李建南赴江海關接收，並以新政府代表任命羅福德續任稅務司，江海關從此易幟。<sup>45</sup>

接收海關同時，日本也有計劃地在海關安插日人。中日戰爭爆發前，全國各口岸的日籍關員共75人，迄1938年底，日籍關員達266人，占全部海關外籍人員的45.7%，同時更積極準備在漢口、廣州等口岸安插更多日人，全面擴大對海關的掌控。<sup>46</sup>1938年3月，青島和煙臺稅務司皆由日人出任，日本大使館甚至透過總務科稅務司表示，華北一切中外關員的調動都必須向他們和臨時政府報告，直接挑戰總稅務司的人事管理權。總稅務司雖未正式答應此要求，卻也不得不以事先將調任人員名單私下通知大使館的方式保全面子。<sup>47</sup>1938年英日協定實施後，各占領區內的海關華員名義上雖奉稅務司之命而行，然各關均增加日籍內外勤關員控制一切關務，如無日籍高級職員簽准，不得辦理結關手續。總稅務司署所發通令，雖仍舊依照國民政府財政部或關務署，轉令各關遵照辦理，惟國民政府對淪陷區海關的主權，早已名存實亡。

1940年3月南京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由於自認與原先的中國政府一脈相承，並

43 蔡渭洲，《中國海關簡史》，頁158。

44 「1938年1月6日梅惟亮致梅樂和關於1937年7月至12月底華北海關概況的節略」、「1938年2月19日梅樂和致郝伯樞函」、「1937年12月18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424號代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29、32、146-147。

45 「1938年5月6日羅德福致梅樂和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60-1。

46 「1939年2月11日梅樂和致孔祥熙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69-70；蔡渭洲，《中國海關簡史》，頁159。

47 「1938年3月31日梅樂和致寇爾、那琪安和高斯關於日本干涉淪陷區各關人員任用問題的節略」，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58-9。

未重新任命總稅務司，因而梅樂和得以續任其職。<sup>48</sup>截至1941年為止，日本在中國控制了80%以上的海關徵稅地區。處於日本占領區的海關計有14個，其中僅有2個海關由日人擔任主管，日本當局再三要求任命日籍稅務司主管津海關、江海關和粵海關等大關，卻一再遭到總稅務司拒絕。6月起，日本政府決定以停付占領區海關所分擔的總稅務司署經費，逼迫梅樂和就範。<sup>49</sup>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占領上海的日軍當即開進公共租界俘擄梅樂和，任命總理文案稅務司岸本廣吉接替，於是總稅務司署由日本勢力全面接管。轉進重慶的國民政府匆匆派遣雲南騰越的英籍稅務司周驪（C. H. B. Joly）在重慶另立總稅務司署，此後非淪陷區各關皆由其統轄。於是總稅務司署分裂為二：一是汪政權管理下的上海公共租界原總稅務司署；另一為重慶總稅務司署，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才再度合而為一。<sup>50</sup>

### （三）從法幣到圓域貨幣

早在1905年1月，總督府即命令臺灣銀行在廈門發行貨幣，以整合中日間貿易關係。臺灣銀行首先發行以日本銀圓為準備金的「銀票」，繼而普及到福州、汕頭等地。同時，在「銀票」流通較少的地區，則發行以福州通用銀兌換的「番票」和以汕頭通用銀兌換的「汕票」。<sup>51</sup>圓域貿易圈的概念在當時尚未出現，臺灣銀行此舉不見得有塑造日圓集團的積極企圖，但透過上述通貨的發行，不但謀日本商店交易上的方便，且使各界人士免除日常硬幣授受的不便，進而提高日本經濟的勢力與信用，所以其目的「不外扶植日本資本的勢力」。<sup>52</sup>

繼而組成日滿中集團的呼聲漸起，於是日本在華北進行頻繁的軍事行動時，也考慮到發動戰爭後的金融問題。最初日本試圖運用在華北已流通的朝鮮銀行券（以下稱「鮮銀券」），因為鮮銀券雖只是殖民地通貨，卻可與日圓等值換算，藉此可

48 「1940年4月6日梅樂和致寇爾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85。

49 「1941年6月4日梅樂和致寇爾和洛克哈德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87。

50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民國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頁442-4。

51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福建政策〉，收入於氏著，《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頁49。

52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第1版），頁62。

將華北建設成一個以日本、滿洲國和華北依存關係為中心的金匯本位通貨流通關係的金融地盤，一舉排除法幣在華北的流通勢力。因而在七七事變發生後，日軍在華北以大量鮮銀券支付各項費用。不料發行額大增的結果，造成鮮銀券的貶值，華北人民紛紛拒用鮮銀券交易，其幣值也由戰前的100元兌換法幣103元貶為88元；更由於鮮銀券與日圓等價兌換，連帶拖累了日圓的價值，日本政府不得不考慮在華北發行日圓體系的新貨幣。<sup>53</sup>

1938年3月，華北王克敏政權宣布拒絕承認中央銀行，為了執行本身的通貨政策，遂設立「聯合準備銀行」以發行「聯銀券」，並指定河北省銀行代替中央銀行收稅。<sup>54</sup>同時強迫華北各關稅務司同意用日圓、聯銀券以及河北省銀行鈔票完稅，和法幣等值使用。由於貨幣短缺，且華北政府規定法幣按票面打折，秦皇島、天津、煙臺和青島等四關，在徵收旅客行李物品的關稅時，不得不同意用日圓完稅，日圓同聯銀券和法幣等值使用，而一般民眾也極力釋出聯銀券，結果使得當地關稅幾乎全用聯銀券繳納。<sup>55</sup>

由於聯銀券無法兌換外幣，也不能用以償付外債，<sup>56</sup>因此即使華北已有日本扶植的政權，但當地對其他非日圓集團國家進行貿易時，仍舊以國民政府的法幣為媒介，外匯交易也由第三國銀行獨占，且以法幣1元兌換英幣8便士的低匯率加以壟斷。1939年起，日本決定進一步強化華北的貿易統制。3月11日以後，華北政府下令禁止法幣流通，同時把華北的外匯市場公定市價提高到聯銀券1圓兌換英幣14便士，且統由聯合準備銀行負責輸出匯兌。同年9月，二戰爆發，英國為避免在遠東地區與日本衝突，同意租界工部局聯銀券與法幣同在租界內流通，並且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將原本存於天津交通銀行內的銀元和銀塊，由日本和英國領事共同封存；1943年日本銀行又貸款兩億元給聯銀，使聯銀券幣值因為準備金增加而日漸上

53 林美莉，〈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年6月），頁114-5。

54 「1938年3月12日梅樂和致寇爾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47。

55 「1938年10月21日梅樂和致華南各關稅務司函」，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137。

56 「1938年3月17日梅樂和致梅惟亮電」、「1938年3月20日寇爾致英國外交部電」，陳翰笙、千家駒主編，《非法協定》，頁48-49。



漲。<sup>57</sup>於是，一方面統一了華北與日本的通貨，另一方面也提供作為兩地間貿易的通用貨幣。透過聯銀券，日本在1939年大致將華北編入圓域貿易圈，即使以法幣勢力最強的租界地天津而言，到了1941年也在事實上成為純粹的聯銀券流通區，外地匯款人匯法幣至此後，必須兌換成聯銀券始能使用。<sup>58</sup>

華中、華南地區的情形相對複雜，最初是以日圓為華中地區軍費支出的通貨，隨著戰事延長，為免日圓流通數額過多而影響幣值，乃師法日俄戰役時的故技，在華發行軍票。最初僅是日本軍方發出專供軍隊使用的徵發證券，並不具有通貨的法償性，其後改由大藏省發行，取得圓域貨幣的地位，與鮮銀券、臺銀券、聯銀券地位相當，均可等值兌換日圓。在強化軍票地位後，華中地區於1938年11月1日起實施軍票一元化政策，華南則在9日正式實施。到了1939年底，完成利用軍票將華中與華南占領區納入圓域通貨範圍的工作。<sup>59</sup>

儘管如此，法幣仍是當地貿易清帳的主要通貨。為了改善對華中、華南的貿易，日本商工會議所及日本貿易振興協議會甚至還建議以承認法幣為現實通貨作為過渡對策，並利用法幣以獲取外幣。基於現實考量，日本當局認為只要能維持日圓對法幣的固定匯率（1：1.75），並不反對。<sup>60</sup>於是日本利用法幣的信用，授意維新政府發行華興券，與法幣等價聯繫，爭取與法幣相等的地位，藉以套換法幣。發行的單位華興商業銀行於1939年5月1日在上海設立，同時發行鈔票，日方利用它來取得法幣與物資，把貨物輸出以換取外匯，並以之作為海關納稅的關金單位。不過維新政府並未以任何法令規定華興券為法律上的償付媒介，因此僅能算是一種商業銀行的信用票據；加上其發行額並不大，流通數量遠遠不及軍票及法幣，迄1940年底在汪政權與日本達成協議之下停止發行，驅逐法幣的計畫並未成功。<sup>61</sup>

1940年3月，汪政權建立不久，隨即設立「中央銀行籌備委員會」，準備發

57 林美莉，〈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頁122。

58 林美莉，〈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頁123。

59 林美莉，〈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頁155-8。

60 中井省三，《日本戰時貿易政策と輸出入リンク制度論》（東京：千倉書房，昭和14年5版），頁35-37。

61 從1939年5月15日至1940年12月9日的發行期間，華興券總發行額只有560餘萬元，而當時華中地區流通的法幣則有20億元。參見林美莉，〈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頁168。

行新貨幣，此時日本軍部恐影響軍票流通而加以反對，直到1940年底，雙方達成協議，在承認既有的軍票與聯銀券的前提下，由日本顧問與資金協助設立中央銀行。<sup>62</sup>同時汪政權的行政院會議也通過「整理貨幣暫行辦法」，規定「中央儲備銀行」有發行、兌換貨幣的特權，其名稱亦稱法幣（以下稱「中儲券」），凡納稅、匯兌及一切公私往來，一律行使，與現行法幣等值流通，以後逐漸收換；取消華興銀行貨幣發行權（即前述華興券）；中儲券在特定區域暫不適用，軍票及聯銀券維持現狀。<sup>63</sup>1941年1月6日，「中央儲備銀行」在南京成立，開始發行中儲券。<sup>64</sup>

汪政權的中儲券初行時，與舊法幣等值流通，<sup>65</sup>遂不免受其幣值影響。10月下旬，傳聞重慶有意放棄上海舊法幣市場，投機者復推波助瀾，使上海人更加心生恐慌，軍票日漲，舊法幣益跌，上海金融市場紊亂不堪。惟舊法幣發行權在重慶，軍票發行權則操於日方，汪政府不得不求助於日本當局。日本駐華大使館即召集陸、海軍及「興亞院」開會，主張新法幣（中儲券）脫離舊法幣，與軍票聯繫。<sup>66</sup>然而，財政部顧慮此時新、舊法幣脫離，勢必造成貨幣流通額不足，因此考慮將目前已發行之新法幣脫離舊法幣，使與日圓聯繫，以安定其價值；另發行新幣，仍與舊法幣等值使用。如此雖為複本位，但一面可謀財政之安定，一面可樹立貨幣政

62 12月17日，雙方簽署「關於設立中央儲備銀行之覺書」，要點為：一、資本由華興商業銀行借入（法幣）相當於五千萬元的美金；二、聘請日本顧問，凡有關中儲行之營業、理事會決議、國外匯兌與外國銀行的關係、國民黨法幣等舊通貨、軍票及日本通貨等項，以及與華北關係事項等，均需諮詢顧問；三、中儲行所保有外匯須存入日本銀行，由中日雙方組成外匯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及運用；四、確認軍票既成事實，將來亦應存入一定數額的通貨存款；五、確認聯銀券的事實，並使其不動搖。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頁394-5。

63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頁394-5。

64 本段所述，係1940-1942年間，日本在華中建立日系通貨的過程，文中的「中華民國」係指南京汪政權。

65 所謂新舊法幣，係參照當時日人留下的文獻之習慣用語，意在區別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與汪政權所發行的中儲券，為避免作者本身行文的混淆以及造成讀者的誤解，拙文此處仍保持此稱呼。

66 「興亞院」是日本侵華時期，打著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1938年12月14日於東京設立，主要目的在掌管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相關事務、政策的樹立，以及監督在中國各會社的業務，1939年3月7日並在北京、張家口、上海、廈門、青島各地設置該院的現地機關聯絡部。見植田捷雄，《東洋外交史》，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9月初版），頁617-618。

策。<sup>67</sup>由於日籍顧問與財政部看法分歧，甚至日本政府與軍部的步調也不一致，使政策始終搖擺不定。

迄珍珠港事變爆發後，日軍隨即進占天津、上海方面的英租界及共同租界，將華中地區納入圓域貿易圈一事再無退路，停用舊法幣成了日本國策。1942年3月6日，日本內閣通過「興亞院」擬定的「華中通貨暫行處理要綱」，決議剝奪舊法幣為貿易通貨的功能，將其逐向「敵區」；同時使中央儲備銀行成為日本軍費及其他必要資金的調劑銀行。<sup>68</sup>至30日正式發表新、舊法幣脫離聲明：自31日起，廢除中儲券與法幣等價流通，今後凡納稅、完糧及一切交易，一律使用中儲券；目前使用的法幣輔幣券，仍准暫時流通。<sup>69</sup>在日本蓄意驅逐舊法幣的政策下，其價格不斷貶值。1942年初，軍票對舊法幣的市場尚以26又1/2圓賣出、27圓買進；3月30日公布停止新、舊法幣等價流通後，舊法幣兌換軍票降至13圓至14圓之間；5月20日以後，舊法幣跌勢益顯，兌換市場僅剩9圓。在財政部公布「整理舊法幣條例」，命舊法幣限期兌換完畢後，終使舊法幣停止流通。<sup>70</sup>7月24日，周佛海在東京出席讀賣、朝日等新聞社的歡迎會上，談如何實現全面和平時提到「增加生產，俾在物資上與日本協力，通過統一通貨，致力於生產事業，在戰時必要物資之範圍內，全部貢獻於保衛大東亞戰爭」。<sup>71</sup>日本將中國占領區納入圓域貿易圈的工作，至此宣告完成。<sup>72</sup>

67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頁530-538。

68 「華中通貨暫行處理要綱」規定：一、對國民黨法幣進行壓迫，使其價值低落，在不構成對其支持的情況下，向敵區驅逐，並考慮禁止其流通的措施。二、立即廢止中儲券與法幣的等價兌換，限制法幣存款，並向中儲券存款轉變。三、廢除對法幣的牌價基礎。四、實行貿易和匯兌管理，剝奪法幣為貿易通貨的職能，強化中央儲備銀行，使其發揮中央銀行的職能。五、使中央儲備銀行成為日本軍費及其他必要資金的調劑銀行，整頓擴充顧問制度，採取圓滿而積極的方法獲得中儲券。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頁603。

69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頁581、585、588。

70 水津彌吉（臺銀頭取），〈東亞の經濟、臺灣の經濟〉，《臺灣時報》，第274號（昭和17年10月），頁53-54。

71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頁629。

72 此時汪政權統治下的地區，仍是中儲券與軍票並行的局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興亞院即決定要停止發行新軍票，但因日本侵華軍當局反對及中儲券不足，一直未能實行。1943年3月，因中儲券貶值等打擊，日本有關當局決定自4月1日起在華中、華南占領區停止發行新軍票，其軍費支出、銀行存款、借款、匯兌等，不再使用軍票，但已發行軍票也不收回，並承認軍票之流通及軍票之債權債務關係得繼續存在。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頁714、

總結上述，華北地區日本先後利用了鮮銀券、聯銀券來驅逐法幣，將之納入圓域貨幣體系當中；至於華中、華南地區則相繼發行了軍票、華興券、中儲券才完成相同的工作。在統合時程上，雖然日本以軍事占領的時間相去不遠，不過當華北在1939年逐步透過通貨統合、匯兌管理、貿易統制被納入「圓域貿易圈」時，華中、華南儘管已為日本所實質占領，卻仍被視為圓域之外的第三國。究其原因，國際利害關係的錯綜複雜固然有影響，而最主要還是由於法幣在華中、華南的勢力依然根深蒂固，延緩統合時程，不但可以避開與列強間的正面衝突，也留下一個讓日本政府用來套取外匯的轉圜空間。

### 三、貿易政策與對圓域圈貿易的統制

中日戰爭時期日本的貿易政策，存在著一個根本的矛盾：一方面，它不斷透過關稅與貨幣政策，將滿洲、關東州以及中國占領區納入圓域貿易圈內；另一方面，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它又極力遏止臺、日對上述地區有過於密切的貿易關係。這種相互扞格的貿易方向，實來自於因應戰爭進程所採行的不同經濟政策所致。

1930年代以後，由於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使得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受到嚴厲挑戰。日本也不可避免的開始修正，在對外貿易上採取「輸出合理統制」；七七事變爆發後，軍國主義盛行，國家力量對經濟的控制更形深入。此後日本貿易政策，同時受到本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世界政治經濟變革的影響，自由主義傳統逐步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日甚一日的貿易統制政策。

1940年9月27日德、義、日「三國同盟」的締結是重要分界點，日本貿易統制可以此劃分為「準戰時體制」（1937.9-1940.9）與「戰時體制」（1940.9-1945.8）。「準戰時體制」下，實施貿易統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取得軍需資材，並設法獲取外匯以平衡國際收支；迨進入「戰時體制」後，平衡國際收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貿易統制目標轉為各殖民地或占領地的生活必需品自給，以期建立東亞共榮圈貿易。<sup>73</sup>

723。

73 這個分期概念大致參照當時人的看法，如田淵實、大浦賢在，〈臺灣貿易の統制〉一文中，將臺



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對待圓域貿易圈的態度亦有所差別。準戰時體制時期，為了避免對圓域過度輸出，阻礙英鎊或美元的取得，導致入超過大，所以對圓域內的區間貿易並不鼓勵，甚至加以抑制；相反地，戰時體制下，由於以英、美為首的反軸心陣營，確立了ABCD對日包圍圈，<sup>74</sup>特別是美國對日本經濟制裁日甚，1941年7月25日凍結日本在美資產，以報復其對西貢的侵略；隨之英、印、緬、加等國也相繼斷絕對日通商，此時日本對外貿易被完全隔絕在美元、英鎊集團外，對圓域內的貿易遂轉趨積極，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後，美、日正式開戰，共榮圈貿易的建立更形具體化。

如此一來，二戰末期的臺灣與中國大陸，雖同在圓域貿易圈內，但兩地的貿易往來，除了受到日本將中國納入圓域的進程影響外，還需視日本在不同時期對圓域的不同政策而定。本節擬先敘述戰時體制下的貿易管制措施，繼而探討在此貿易體制下對圓域貿易的態度轉折。

### （一）「戰時體制」下的貿易管制措施

早在經濟大恐慌發生之際，日本已開始對貿易採取有限度的管制；當中日戰爭全面擴大後，為因應長期戰爭的需求，於是將經濟結構強行改造為準戰時體制，生產力的擴充、國民生活的安定、貿易的振興並列為準戰時經濟三大方針，貿易部門亦隨之進展為高度的統制化。<sup>75</sup>俟「戰時體制」確立後，貿易統制範圍更從原先的輸出入商品擴及輸出入機構，「統制機關」和「配給機關」相繼出現，將輸出入及輸出入品用原物料的配給一手掌控。

1941年4月9日，總督府公布「輸出品及輸出品用原物料配給統制規則」，規定

---

灣的貿易統制分為三個階段：從金輸出再禁止迄昭和12年輸出入品相關臨時措置法為第一期；從臨時措置法迄德、日、義同盟（昭和15年9月27日）為第二期；從三國同盟迄大東亞戰爭爆發為第三期。也有學者將第三期劃至昭和16年7月26日美、英、荷對日施行資產凍結為止，其後則稱為第四期。詳見田淵實、大浦賢，〈臺灣貿易の統制〉，收入於《臺灣經濟年報》，第二輯（昭和17年版）（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7月2刷），頁238-239。

74 田淵實、大浦賢，〈臺灣貿易の統制〉，頁238。作者並未對「ABCD」加以解釋；按當時的國際情勢，應為美國（America）、英國（British）、中國（重慶政府China）、荷蘭（Dutch）四國。

75 田淵實、大浦賢，〈臺灣貿易の統制〉，頁246；酒井澤喜，《日本貿易統制機構》（東京：修文館，昭和17年初版），頁18。

特定的輸出品，非由臺灣總督所指定的機關（稱「統制機關」），或由統制機關委託輸出或承買，則不得輸往圓域以外的國家；向輸出統制機關承買指定輸出品或接受委託輸出業者，須遵從統制機關指示，從事該指定輸出品之輸出。同時，製造指定輸出品所需的原物料進口後，須經臺灣總督指定機關（稱「配給機關」）才有權販售。<sup>76</sup>受臺灣總督指定的「統制機關」和「配給機關」為「臺灣貿易振興株式會社」，總督府企圖透過本會社來壟斷貿易業務的用意至為明顯。<sup>77</sup>

隨著政治情勢緊張，國際貿易條件更形惡化。1941年起，即使擁有外匯也不見得買到所需物資，載運船隻的缺乏更是一大問題。因此，政府要求業者在輸出的同時必須能運回重要物資，才得以通過統制機構審查，獲得配船。在此情形下，貿易活動必須由政府機關依據完整的情報擬定輸出計畫，不能再任由業者各自去判斷。<sup>78</sup>於是，日本帝國議會依據「國家總動員法」制定了「貿易統制令」，<sup>79</sup>內地自1941年5月15日，朝鮮、臺灣、樺太及南洋群島則自5月25日起施行。<sup>80</sup>該令賦予臺灣總督更大的權力，因應戰時的需要，總督除了可以限制或禁止輸出入外，還可以對輸出入品的讓渡、持有、移轉進行處分；且可以國家安全之名，徵調輸出入品相關報告，甚至對公司行號、店鋪、倉庫或其他場所進行臨檢，檢查其業務狀況、帳簿、文件等。9月13日公布「貿易統制令施行規則」作為其施行細則，同時廢止了1937年以來的「臨時輸出入許可規則」。<sup>81</sup>在此之前，臺灣總督雖有權指定調整機關、限制輸出入品的內容及輸出入地區，對於依法提出申請的輸出入事項，理論上不能加以拒絕。但是透過本規則的修訂，總督的權限擴大到可以取消或變更輸出及輸入命令，即使是調整機關，其輸出入數量及金額也分別加以設限。至於輸出調整

76 《臺灣總督府報》，第4159號（昭和16年4月9日），頁41-42。

77 田淵實、大浦賢，〈臺灣貿易の統制〉，頁256。

78 酒井澤喜，《日本貿易統制機構》（東京：修文館，昭和17年），頁16。

79 「國家總動員法」（1938年4月1日法律55號）第8條：「政府於戰爭之際，若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得以敕令對物資的生產、修理、配給、讓渡及其他處分、使用、消費、持有、移動等頒布相關規定」；第9條：「政府於戰爭之際，若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得以敕令限制或禁止輸出入、命令輸出入、課徵輸出入稅或增課、減免輸出入稅。」見《臺灣總督府報》，第4196號（昭和16年5月24日），頁117。

80 《臺灣總督府報》，第4196號（昭和16年5月24日），頁117。

81 「府令第百七十一號」，《臺灣總督府報》，第4291號（昭和16年9月13日），頁66-68。

機關以及列為限制輸出及輸入的商品，則在稍後以告示815、816、817號公布。輸出調整機關為「臺灣貿易振興株式會社」及「臺灣罐詰共販株式會社」；受限制輸出及輸入商品種類之多，前所未見，除書畫、骨董外，幾乎全部列入。<sup>82</sup>

值得注意的是，前一階段的貿易統制，主要是針對臺灣與第三國的貿易，亦即圓域貿易圈以外的國家，至本階段則擴及同屬圓域貿易圈的南洋，甚至殖民母國日本。對南洋貿易統制始於1941年初，由於1940年6月法國向德國投降，切斷了其與東方殖民地法領印度支那（越南）間的聯繫，日本趁此機會，將發展法領印度支那通商，視為南洋貿易的新方向。<sup>83</sup>由於擔心放任業者自由發展，會出現毫無遊戲規則的競爭，總督府遂於1941年2月6日依據「臨時措置法」，公布「南洋貿易調整規則」，對南洋貿易加以限制。<sup>84</sup>該項貿易所規定的特殊商品為麥芽、豆類、油脂類、綿絲等；指定區域為法領印度支那，隨著日本在南洋地區的進展，同年11月時，又增加了泰國；<sup>85</sup>負責的輸出「調整機關」為「臺灣南洋貿易聯合組合」。<sup>86</sup>

至於對內地的貿易統制，與對南洋約莫同時展開，這是鑒於決戰無可避免，遂希望臺灣至少能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做到自給自足。1941年4月9日公布「臨時移出入品調整規則」，賦予臺灣總督有權對臺、日間貿易作有系統的管制。管制方式則由臺灣總督指定移出入「調整機關」，凡受指定物品之移出入，皆須由該機關負責。其項目及調整機關如下：<sup>87</sup>

82 《臺灣總督府報》，第4291號（昭和16年9月13日），頁70-79。

83 田淵實、大浦賢，〈臺灣貿易の統制〉，頁254。

84 「府令第卅二號」，《臺灣總督府報》，第4108號（昭和16年2月6日），頁26-27。

85 「告示第千四十九號」、「告示第千五十號」，《臺灣總督府報》，第4344號（昭和16年11月21日），頁95。

86 「告示第六十八號」、「告示第六十九號」、「告示第七十號」，《臺灣總督府報》，第4108號（昭和16年2月6日），頁30-33。

87 對內地貿易的管制品以及管制機構，在本規則頒布後，屢有變更：同年12月又制定了「臺灣鮮魚介生產配給等統制規則」，將海產類的移出、入機關改由新設立的「臺灣水產物輸移出組合」負責；1942年4月將豆類、番薯、樹薯等項去除；1943年2月移出管制品增加了石花菜，移出調整機關為「臺灣水產物輸移出組合」；7月又增加了香蕉、橡膠製品、蘭草等管制品。參見「告示第千百三十五號」，《臺灣總督府報》，第4363號（昭和16年12月12日），頁45；「告示第四百十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19號（昭和17年4月23日），頁131；「告示第三百三十七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268號（昭和18年2月26日），頁99；「告示第六百六十六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382號（昭和18年7月13日），頁53。

品 名	移出調整機關
豆類、落花生、澱粉類、胡麻子、蔬菜、果實及核子、番薯簽、姜黃、樹薯	臺灣農會
生鮮魚介類	臺灣鮮魚輸移出組合
羽毛	臺灣羽毛輸出振興株式會社
獸骨、植物性揮發油、香茅油	臺灣香茅油輸移出組合
木炭（燃料用）	臺灣山林會

資料來源：「告示第二百四十六號」，《臺灣總督府報》，第4159號（昭和16年4月9日），頁46。

隨著戰事緊迫與物資的缺乏，內地、臺灣間的物資移動受到更嚴格的規範。1944年3月，「臨時移出入品調整規則」大幅減併，同時將原本不具強制性的移出、入調整機關改為強制設立，至此，非經由移出入「調整機關」或其委託者，則無法將指定品移往內地或由內地移進臺灣。<sup>88</sup>以往臺灣貿易統制對象是以對外國貿易為主，此時擴及對內地的貿易統制，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也正彰顯出，臺灣雖是日本貿易政策的一環，但因身為孤島的特殊性，使得臺灣的戰時貿易統制不全然與日本的政策相同，臺灣總督仍具有相當的決定權。<sup>89</sup>

## （二）「大東亞共榮圈」下的臺灣與圓域貿易

1930年代，世界各地普遍出現集團化的共同傾向，日本國內對於確立「東亞集團」的聲浪也日益增強。不過，儘管政治部門有如此強烈要求，經濟部門卻不得不放慢腳步，採取相反的政策。1941年以前的「準戰時體制」時期，對外貿易的目標在輸入大量軍需材料與平衡國際收支，對黃金產量並不豐富的日本而言，促進輸出以獲取外幣無疑是最佳且是唯一的手段。不過，由於滿、關、中等地區的貨幣制度是以日圓來連結，對當地的輸出貿易實與國內通商無異，不但無法獲取任何外幣，更無益於國際收支的改善。<sup>90</sup>因此，減少對當地的輸出，以便將多餘物資轉向第三國出口實有其必要性。最直接的表現，便是抑制具有政治一體化關係的圓域圈貿易。<sup>91</sup>

88 「府令第七十一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575號（昭和19年3月4日），頁21。

89 田淵實、大浦賢，〈臺灣貿易の統制〉，頁254-5。

90 酒井澤喜，《日本貿易統制機構》，頁13。

91 中井省三，《日本戰時貿易政策と輸出入リンク制度論》，頁24。



然而這種情形，到了1941年以後卻有了重大轉折。1941年7月25日，美國為抵制日本侵略越南，下令凍結日本在美資產，包括現金、支票、票據、金塊、銀行存款、公債及股票等，並禁止汽油輸往日本，封存國內生絲；翌日，英國及其屬地加拿大、澳洲、南非、紐西蘭、印度、緬甸及荷屬東印度，也都採取凍結行動，並宣布廢止與日本訂立的一切商約；繼而美、英等國還應中國（重慶）政府之請求，同時對中國在美資產實行凍結，以穩定中國金融，並打擊日本套購占領區外匯。<sup>92</sup>兩天後，日本大藏省隨即公布了報復性措施「關於外國人交易取締規則」加以反擊。適用本規則的國家有美國及其全部領地、菲律賓聯邦、加拿大、英國、香港、荷蘭以及蘭領印度等，臺灣亦於同日以府令公布施行。<sup>93</sup>至此，日本的對外貿易完全被孤立在美元、英鎊區域之外。這個決定性的事件，讓日本不得不朝著「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而邁進；12月8日，日本對英美宣戰，大東亞戰爭正式爆發，更確立了東亞貿易自給的必要性，貿易亦朝此方向進行調整，<sup>94</sup>對第三國貿易既已無望，如何加強圓域內的貿易便成了貿易統制的重心。

加強圓域間貿易的第一步，便是免除相互間的關稅。臺灣與關東州及滿洲國間原本即有特惠的協定稅率，美、英實施資產凍結令後，總督府隨即在8月5日頒布「輸入稅免除相關規定」，免除前述兩地產品的輸入稅。獲免除輸入稅的滿洲國產品，計有玉蜀黍、蕎麥、豆類、大豆油、炭化水素油（碳化氫油，一種燃料用油）、礬土、瀝青、纖維素紙漿、焦炭、鋁及鋁合金、鎂及鎂合金、木材、木炭等13項（附表甲號）；關東州產品則有玉蜀黍、蕎麥、豆類、大豆油等38項（附表乙號）；另外，關東州生產的禽畜肉類一項（丙號）則給予1%的優惠稅率。<sup>95</sup>1943年，滿洲國的免稅品增列了禽畜肉類、落花生油、棉子油、甘草越幾斯（「かんぞうエキス」之漢文寫法，亦即「甘草精」）、中藥（黃芩等）、船舶等6項；關東州則增列原本的特惠稅品禽畜肉類及棉子油；同時，免稅的優惠擴及到「中華民國

92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頁496。

93 中島一郎（總督府財務局長），〈外國人取引取締規則公布に就て〉，《臺灣時報》，第261號（昭和16年9月），頁3。

94 田淵實、大浦賢，〈臺灣貿易の統制〉，頁256。

95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380號（昭和18年7月10日），頁45-46。

國」(南京汪政權)，其免稅品計有玉蜀黍、豆類、菜子及芥子、禽畜肉類、鳥蛋、鳥蛋粉、落花生油、棉子油、獸脂、菜種油、甘草越幾斯、阿膠、中藥(黃芩等)、漆、船舶、木材、木炭等17項(丙號)，與前述兩地的重疊性相當高；另外「中華民國」產的蔬菜、水果以及頭巾兩項則分別給予從價三成及從價四成的優惠稅率(丁號)。<sup>96</sup>

前述的免稅優惠期限原本僅有三年，1944年期限將屆滿前，總督府再公布新的「輸入稅免除相關規定」，凡是關東州及滿洲國所生產的物品，一律免除其輸入稅；至於「中華民國」的產品則分免稅品(甲號)及優惠稅率(乙號)，項目同前，有效期限至大東亞戰爭結束後一年。<sup>97</sup>

其次，為了鼓勵輸出，特別取消了數種重要輸出品之國內稅。日本雖早在1899年即廢除了輸出稅(臺灣則遲至1910年始廢除)，但為了增加稅收，仍屢次對移出或輸出品附加各種稅賦，如酒類出港稅、砂糖消費稅、織物消費稅、揮發油稅、骨牌稅等，雖無關稅之名，却有其實。為了鼓勵對圓域貿易圈的輸出，1943年3月特別將用以輸出的酒類、清涼飲料、砂糖、糖蜜、糖水、糖果、揮發油、骨牌等物品之國內稅加以免除；同時關東州生產並輸入的前述物品亦免除或減輕其輸入稅。<sup>98</sup>惟施行於臺灣及樺太時，則將酒類及清涼飲料排除在免稅之外。<sup>99</sup>

第三步的措施，便是整併貿易統制法令。在此之前，臺灣對外國貿易的統制存在三種各不相同的法令，既有用來規範第三國貿易的「貿易統制令施行規則」，也有適用於南洋的「南洋貿易調整規則」，對關東州、滿洲及中國等圓域地區則另有「對關東州、滿洲及支那貿易調整相關規定」。此時的貿易對象既已無法越出圓域貿易圈外，為了確立「東亞共榮圈」的自給自足體制，並加速圈內物資交流，勢必要將貿易法規加以統一簡化。於是，1943年2月將「南洋貿易調整規則」及「對關東州、滿洲及支那貿易調整相關規定」併入「貿易統制令施行規則」中，成為臺灣對外貿易統制的唯一法源。此後，凡是總督府所指定的輸出入品，不論輸往何方，

96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380號(昭和18年7月10日)，頁46-47。

97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637號(昭和19年5月8日)，頁34。

98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294號(昭和18年3月28日)，頁120-121。

99 「敕令第二百六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303號(昭和18年4月9日)，頁49。

若未經臺灣總督許可，且藉由調整機關承買、委託，則禁止輸出入。<sup>100</sup>至此，完成了戰時貿易統制的整編，臺灣的貿易亦往戰時的、且是最後階段的國家管理邁進。

隨著貿易法令的整併，貿易機構也同步整編。以往分別作為滿、關、中及南洋貿易調整機關的「臺灣東亞貿易聯合組合」與「臺灣南洋貿易聯合組合」解散，臺灣總督另行指定「臺灣貿易會」為調整機關。<sup>101</sup>該會最初僅為圓域貿易的專門調整機關，1943年「貿易統制令施行規則」修改後，對南洋或內地的貿易，也都由其處理。組成會員共計11個，業者須依照項目別，經由會員向「臺灣貿易會」辦理手續，始可從事輸出、入業務。<sup>102</sup>不過，「臺灣貿易會」成立後，即存在著缺乏法源依據、經費短缺、以及組織功能重複等問題，所以不到一年便遭裁併。<sup>103</sup>

戰爭末期，為了加緊對重要物資的掌控，日本政府在東京設立「重要物資營團總事務所」，同時規定，如經政府許可，得在認為必要的地方設置從屬事務所。於是1944年1月，總督府以法律第一號公布「臺灣重要物資營團法」，<sup>104</sup>並於3月成立「臺灣物資重要營團」為新的調整機關，將原先的「臺灣貿易會」，以及1941年4月以來，一直擔任輸出品及輸出品用原、材料配給機關的「臺灣貿易振興株式會社」加以合併。<sup>105</sup>

「臺灣物資重要營團」負責業務主要有四項：其一，限制輸出入品的輸出入

100 「府令第十九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255號（昭和18年2月10日），頁23-24。

101 「告示九十號」、「告示九十一號」、「告示九十二號」、「告示九十三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255號（昭和18年2月10日），頁25-31。

102 11個會員分別為：「臺灣石炭會社」、「臺灣罐頭共販會社」、「臺灣茶輪移出統制會社」、「臺灣青果會社」、「臺灣貿易振興會社」、「臺灣專賣品交易組合」、「臺灣砂糖貿易組合」、「臺灣水產物輸移出入組合」、「臺灣雜穀配合組合」、「臺灣飼料輸移入組合」、「臺灣麻袋輸入組合」。此外，原隸屬於「臺灣東亞貿易聯合組合」的「臺灣棉花配給組合」、「臺灣藥品貿易組合」、「臺灣織品紙類貿易組合」、「臺灣木材貿易組合」、「臺灣食糧品貿易組合」、「臺灣雜貨貿易組合」、「臺灣姜黃輪移出組合」、「臺灣專賣品事業用品貿易組合」、「臺灣シトロネフ油輪移出組合」、「臺灣珊瑚輸出組合」、「臺灣纖維製品輸出組合」等全部解散。見維摩居士，〈臺灣貿易會的諸課題〉，《臺灣時報》，第281號（昭和18年5月），頁41-2。

103 維摩居士，〈臺灣貿易會的諸課題〉，頁43-5。

10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誌》，第4卷一經濟志商業篇，頁158。

105 「府令第九十三號」、「告示第三百二十一號」，《臺灣總督府官報》，第591號（昭和19年3月20日），頁131-2。

工作，由該營團承買，並直接輸出入（此時則從以往的相關業者中另選出實務擔當者，擔負實際輸出入工作），或委任相關輸出入業者從事輸出入；其二，以往由「臺灣貿易振興株式會社」負責的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之相關業務亦轉由營團執行；其三，交易上所產生的價格損益調整之相關業務，即依據「為替交易調整法」所設立的匯兌交易調整特別會計，向政府繳納或領取價格差額之業務；其四，輸出品用原材料的承買、販賣或配給事務。<sup>106</sup>換言之，原來分屬「臺灣貿易會」及「臺灣貿易振興株式會社」的輸出調整和原料配給工作，統由「臺灣物資重要營團」負責，完成了真正的一元化統制。這也意味著經濟統制的範圍，不但從貿易統制延伸到物資生產、配給部門的統制，甚至已擴大到消費統制。<sup>107</sup>

總結上述，戰時臺灣的貿易統制與對圓域地區貿易政策的演變關係，可以簡單表列如下：

表1、戰時體制（1940.9-1945.8）下的臺灣貿易統制與圓域貿易政策演變

時間	目標	統制地區	貿易統制方式或法令	調整機關
三國同盟至美國凍結日本在美資產前（1940.9-1941.7.26）	確保軍需材料輸入 平衡國際收支 生活必需品自給	內地	臨時移出入品調整規則	臺灣農會、臺灣鮮魚輸移出組合等
		南洋（法印、泰國）	南洋貿易調整規則	臺灣南洋貿易聯合組合
		第三國	輸出品及輸出品用原材料配給統制規則 貿易統制令 貿易統制令施行規則	臺灣貿易振興株式會社 臺灣罐詰共販株式會社
美國凍結日本在美資產（1941.7）後	建立東亞共榮圈貿易	大東亞共榮圈	貿易統制令施行規則 輸入稅免除相關規定 取消重要輸出品之內國稅	臺灣貿易會 臺灣物資重要營團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上文自行整理。

106 戴下晴治（總督府外事部事務官），〈臺灣の戰時交易統制概要〉，《臺灣時報》，第294號（昭和19年7月），頁26-7。

107 山口一夫，〈事變下臺灣に於ける物資統制〉，《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7月2刷），頁572-577。

## 四、圓域體系下的兩岸貿易

透過前述的措施，日本強化了戰爭時期圓域貿易圈內的貿易活動，這也使得同在圈內的中、臺兩地間貿易往來更形密切。本節接著要從實際數據來探究1940年代兩岸貿易的發展狀況。由於戰爭的因素，日治後期的稅關統計資料甚少發布，1940年下半年以後，更成為絕響，以致精確數據查不可得；<sup>108</sup>再者，本時期的兩岸貿易，無異是日本帝國內部分工的一環，<sup>109</sup>貿易政策制定時，常將中、關、滿視為一體。因此，儘管本時期的大陸地區至少包括四個「政治實體」，即中國本土（含1912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及日本占領後在華北等地扶植的政權）、英國租借地香港、日本租借地關東州（1905年以後），以及1932年宣布獨立的滿洲國。惟本節關於兩岸貿易狀況研究，將以臺灣對整體大陸地區（香港除外）為主，與個別地區的貿易狀況為輔。以下分別說明本時期兩岸貿易的變化及其動因、貿易收支與貿易所占比重、重要貿易品，以及其所展現出和戰前截然不同的面貌。

### （一）貿易的變化及其動因

中日開戰後，臺灣對關、滿、中三地的貿易情況各不相同。對關東州的貿易在1939年曾高達6,086萬圓，遠勝同年對中國占領地的3,534萬圓。<sup>110</sup>對滿洲國的貿易從該國建立以來即不斷成長，絲毫未受戰爭影響，1939年首度達到千萬圓，翌年起更超過3,000萬圓，逐步取代關東州地位。對中國方面，隨著日軍在華軍事行動的開展，兩地貿易逐漸恢復，1941年達7,949萬圓，1944年更達到10,346萬圓，是日本統治時期兩地貿易額的最高峰。為瞭解1940年前後兩岸貿易擴張的情形，茲將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與大陸地區的整體貿易演變趨勢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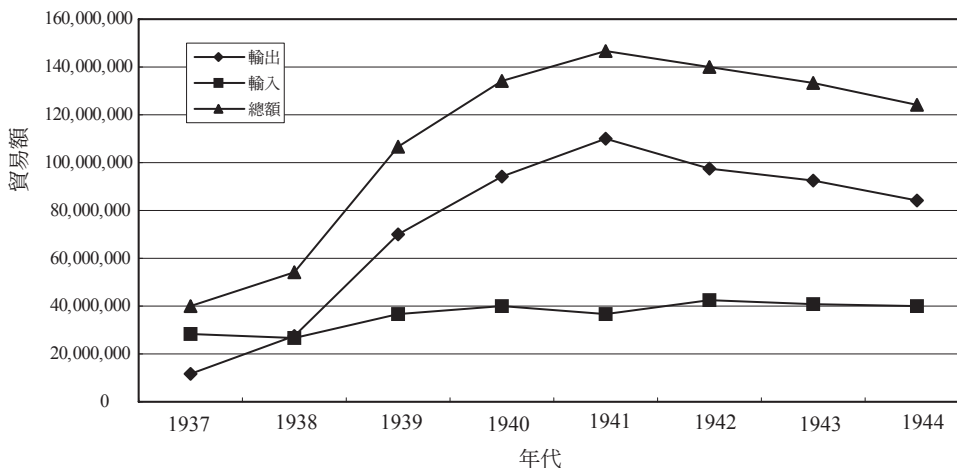
108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頁285。

109 堀和生，〈植民地帝国日本の經濟構造——一九三〇年代を中心に〉，《日本史研究》，第462號（2001年2月），頁42。

110 水津彌吉，〈本島内外の經濟情勢に就て〉，《臺灣時報》，第262號（昭和16年10月），頁20。



圖1、台灣與大陸地區（中關滿）貿易趨勢變化(1937-1944)



資料來源：1937-1939：《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昭和14年）》，頁1；〈昭和14年の臺灣貿易狀況〉，《臺灣時報》，第242號，頁54；1940-1944：《臺灣統治概要》，頁459-460。

1937年中日戰爭發生後，臺灣對大陸地區的貿易並不暢旺，該年度的貿易額為4,722萬圓，較前一年減少540萬圓。隨著日軍占領區的擴大，1939年後快速增加，1940年提高至13,408萬圓。1941年起，日本在臺灣推行更嚴格的計劃經濟，不再以米穀、砂糖二大物產為重，而是朝向主要農作物的全面增產，除了「米穀管理令」、「糖業令」外，新頒布「臨時農地管理令」，實施雜作物的栽種限制，有計劃地進行全面性農業增產。貿易方面則將重點放在確保島內物資與必要物資的輸移入順暢，實施「貿易統制令」、「南洋貿易調整規則」、「臨時輸移入調整規則」，並設置相應統制機關。<sup>111</sup>至1941年下半季，更強化各種統制策略，如公布實施「物資統制令」、「重要產業團體令」、「企業許可令」、「臺灣米穀應急措置令」、整編統制機構、維持低物價、力求物資流動的順暢。<sup>112</sup>在有計劃地生產及交易下，貿易額達到14,645萬圓，是日治時期臺灣與大陸地區貿易的最高紀錄。同年

111 水津彌吉，〈本島内外の經濟情勢に就て〉，頁16。

112 水津彌吉，〈大東亞戰爭下の臺灣金融情勢—昭和十六年度下半期株主總會に於て〉，《臺灣時報》，第268號（昭和17年4月），頁32。

底珍珠港事變爆發，日軍進占天津、上海方面的英租界及共同租界，獨攬租界行政權，華中地區正式成為圓域的一部分，整個中國（重慶政府除外）貿易全被納入大東亞共榮圈，在日本的計劃之下，實施重要物資移動許可制，原料配給的調整及生產販賣的協定。同時由於南洋供給物資與臺灣高度重疊，遂公布「農地作付統制規則」以調整臺灣農業；為了確立國防經濟的目標，砂糖的生產維持現狀，米及其他重要農產增產，至於茶、香水、香茅、水果、煙草等非必要物資的生產則受到抑制。<sup>113</sup>在有計劃減產之下，使得對大陸地區的貿易稍稍衰退，至1944年降至12,739萬圓。

## （二）貿易收支與貿易所占比重

中日戰爭以前，臺灣對中國、關東州和滿洲的貿易，幾乎皆呈現入超（參閱表2，以下同），不過其後則有所轉變，1938年對大陸地區首度出現了35萬圓的出超，相較於前一年，貿易收支改善了1,695萬圓；翌年起出超額年年增加，<sup>114</sup>1941年更高達7,343萬圓，是日治五十年的最高峰；其後三年雖有下降，仍維持在四、五千萬圓之間，1941-44年平均年出超額達5,750萬圓以上。反觀大陸地區以外的貿易，1938年出現了269萬圓的入超，與前一年相較，貿易收支惡化了1,347萬圓，此後更年年減退，有賴新開拓的滿洲、華北、華中等圓域內市場來加以填補。<sup>115</sup>

就個別地區來看，1938年對中國貿易額僅有800餘萬圓，但出超竟達723萬圓，<sup>116</sup>1940及41年更達到5,500萬圓以上的高峰；<sup>117</sup>此後隨著中國輸入增加而略為下降，但仍維持在3,700萬圓以上，1941-44年平均年出超額達4,600萬圓以上，占圓域貿易出超額近九成；對滿貿易仍以入超為主，顯示臺灣對滿洲仍有大量物資需求；

113 水津彌吉，〈東亞の經濟、臺灣の經濟〉，頁48、53。

114 滿尾元志，〈昭和十四年の臺灣貿易狀況〉，《臺灣時報》，第242號（昭和15年2月），頁54；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昭和16年版），頁289。

115 青木武司，〈事變下の臺灣貿易と産業〉，《臺灣時報》，第232號（昭和14年3月），頁33-34。

116 1938年對中華民國的貿易輸出為7,971,638圓、輸入為746,396圓，合計為8,718,034圓，出超7,225,242圓，詳見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昭和14年），頁1。

117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12月臺北2刷），頁459-60。

至於關東州，在臺、滿直接貿易路線開設後，滿洲所產物品不再由此輸臺，該地轉而以輸入臺灣商品到華北為主，因而貿易收支遂從1940年起轉為出超，該年度的出超額為1,677萬圓，翌年則高達2,550萬圓。

其次，貿易所占的比重方面，1940年以前臺灣對大陸地區貿易總額在整體對外國貿易（不含對日貿易，以下同）所占比重雖時有起伏，平均則維持在70%上下，顯見臺灣對該地貿易依存度雖高，但仍與其他地區有相當的往來。其後對大陸地區的貿易依賴情形更為明顯，1941-44年，臺灣對大陸地區貿易在對外國貿易所占比重分別為88%、93%、86%、89%，平均高達89%，幾乎等於隔絕了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

表2、臺灣與大陸地區貿易額（1932-1944）

單位：日圓

	輸出	輸入	總額	出入超	輸出所占比例%	輸入所占比例%	總額所占比例%
1932	8,533,494	18,775,857	27,309,351	-10,242,363	47.29	60.49	55.64
1933	6,725,365	22,713,554	29,438,919	-15,988,189	38.07	64.02	55.40
1934	11,709,110	23,354,601	35,063,711	-11,645,491	44.15	61.41	54.32
1935	17,538,506	29,293,214	46,831,720	-11,754,708	47.99	65.13	57.45
1936	12,737,835	33,826,417	46,564,252	-21,088,582	43.84	69.24	59.77
1937	11,834,000	28,425,617	40,259,617	-16,591,617	39.56	64.27	54.30
1938	27,295,197	26,940,996	54,236,193	354,201	75.09	69.60	72.26
1939	69,960,658	36,401,408	106,362,066	33,559,250	84.09	71.32	79.24
1940	94,154,000	39,921,000	134,075,000	54,233,000	88.19	71.21	82.34
1941	109,937,000	36,508,000	146,445,000	73,429,000	96.34	69.32	87.81
1942	97,283,000	42,897,000	140,180,000	54,386,000	93.98	91.47	93.20
1943	92,590,000	40,882,000	133,472,000	51,708,000	85.58	87.35	86.12
1944	83,825,000	40,280,000	124,105,000	43,545,000	87.76	92.73	89.32

資料來源：1932-1935據《臺灣貿易四十年表》頁408-9計算而得；1935-1939據《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昭和14年）》頁1計算而得；1940-1944據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頁459-60計算而得。



### （三）重要貿易商品

#### 1. 重要輸出品

中日戰爭爆發之前，臺灣對大陸地區的重要輸出品，除了海產、紡織品、火柴等內地轉口商品外，主要為茶、砂糖、煤、酒精以及香蕉、柑橘、鳳梨罐頭、蔬菜等本地商品。戰爭爆發之初，隨著中國的抵制日貨，轉口輸出不再，同時原本輸出華中、華南的茶、糖或蔬果也幾乎全面停止。其後由於政治情勢穩定，總督府有計劃地增產及品種改良，砂糖、包種茶、煤炭、鳳梨罐頭再度成為輸出大陸地區的主要產品。尤其砂糖，以往多半輪往華南，但此期間則逐漸向滿洲國及關東州開拓新市場，輸出額的激增與價格高漲的程度頗為令人注目。<sup>118</sup>臺茶也是本時期輸出大陸地區，特別是東北的重要產品。為了促進臺茶的銷售，1940年8月，總督府特別派遣特產課長前往滿洲國，與該國商務司長簽署關於臺灣茶的輸出入諒解事項，最後雙方且針對臺茶輸滿的統制機關、輸出數量、輸出價格方面達成了數項決議。<sup>119</sup>

#### 2. 重要輸入品

戰前來自對岸的主要輸入品，計有木材、稻穀、包蓆、大豆油糟、大豆、黃麻布袋、硫安、鐵、煤、水泥以及為數不少的雜品。<sup>120</sup>其中肥料（特別是屬於滿洲國特產的大豆油糟）尤為輸入品的大宗，幾乎占了輸入總額的一半。事變發生後，輸入品並未有太大變化，肥料依然獨占鰲頭，其次為大豆（食品、飼料）及麥糠，1939年時，輸入額分別為650萬圓及270萬圓。除了麥糠由上海輸入外，其餘產品皆產自滿洲、關東州，多半由大連輸入。黃麻布袋為砂糖、米的包裝材料，1935年曾達350餘萬圓的最高紀錄，但事變發生後，由於極力回收舊袋再利用，輸入額遂降至300萬圓以下。包蓆則因屬性與黃麻布袋雷同，事變後銳減為40萬圓至60萬圓。<sup>121</sup>至於其他雜品（特別是奢侈品），也由於輸入管制而紛紛減退乃至消失。<sup>122</sup>

118 青木武司，〈事變下の臺灣貿易と産業〉，頁35-36。

119 「臺灣茶貿易に關し 滿洲國と假調印」，《臺灣時報》，第249號（昭和15年9月），頁188-189。

120 青木武司，〈事變下の臺灣貿易と産業〉，頁36。

121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頁290。

122 青木武司，〈事變下の臺灣貿易と産業〉，頁36。

#### （四）兩岸貿易的新風貌

在整編圓域貿易圈政策與實施貿易統制的交互影響下，臺灣對大陸地區的貿易展現了三種和戰前截然不同的面貌：

首先是貿易地區的轉向。先就對中國地區而言，中日戰爭爆發以前，臺灣主要貿易地區集中在華南，至本時期則已轉往華中、華北。日治初期，臺灣在中國大陸的貿易對象以福建為主。1902至1912年間，臺灣對閩貿易值占臺灣對中國貿易值的比例，平均為72.73%，1913年以後較為減少，至1931年之間，平均為51.3%，1932至1937年間平均為50.6%；<sup>123</sup>對整體華南的貿易值，輸入和輸出方面分別在1916年和1932年開始急遽減少，<sup>124</sup>到了中日戰爭之後則完全改觀。不僅對閩貿易頓時中止，<sup>125</sup>對華南貿易更降至四成以下，1942-44年對華南貿易平均僅占全中國的28%。反觀華中及華北則明顯增加，特別是華北輸出增加情形，越到後來越為明顯（參見表3）。華中、華北貿易增加固然與同在圓域貿易圈，享受到關稅降低的好處有關，但華南的同時減退，卻也反映了日本帝國內分工的特性。<sup>126</sup>

再就臺灣整體對外國貿易而言，已明顯侷限在中國大陸地區。如將1932年滿洲建國以後臺灣對大陸地區（含中、關、滿）的貿易總額相對照，即可看出其間的差異（參閱前述表2）。中日戰前臺灣對大陸地區貿易總額占外國貿易比重平均維持在67%上下，顯見臺灣對該地貿易依存度雖高，但仍與其他地區有相當的往來；不過到了1941-44年，同貿易所占比重平均高達89%；尤其輸出更為明顯，除了日本以外，滿、關、中幾乎成了當時臺灣唯一輸出市場，這意味著臺灣等於隔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儘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圓域貿易圈由原本僅有四個貿易單位的「日滿中集團」，擴展為十一個貿易統計單位的「大東亞共榮圈」，但臺灣的主要貿易對象仍固守在上三地。

123 林滿紅，〈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頁657-660。

124 堀和生，《東アジア資本主義史論I—形成・構造・展開》（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年9月初版第1刷），頁84。

125 《臺灣省通志》，第4卷〈經濟志・商業篇〉，頁163。

126 堀和生，〈植民地帝国日本の經濟構造——一九三〇年代を中心に——〉，頁40。

表3、臺灣對「中華民國」貿易額（1937-44） 單位：千圓（%）

年代		華北	華中	華南	全中國
1937	輸出	751 (13)	764 (14)	4,060 (73)	5,575 (100)
	輸入	188 (4)	2,837 (67)	1,229 (29)	4,253 (100)
	總額	938 (10)	3,601 (37)	5,289 (53)	9,828 (100)
1938	輸出	2,380 (30)	4,838 (61)	754 (9)	7,972 (100)
	輸入	93 (12)	482 (65)	172 (23)	746 (100)
	總額	2,473 (28)	5,319 (61)	926 (11)	8,718 (100)
1939	輸出	11,949 (35)	9,445 (28)	12,446 (37)	33,840 (100)
	輸入	244 (16)	852 (57)	404 (27)	1,499 (100)
	總額	12,193 (35)	10,297 (29)	12,850 (36)	35,340 (100)
1942	輸出	26,926 (42)	23,373 (36)	14,493 (22)	64,792 (100)
	輸入	2,376 (14)	10,180 (61)	4,082 (25)	16,639 (100)
	總額	29,302 (36)	33,553 (41)	18,575 (23)	81,431 (100)
1943	輸出	32,579 (55)	14,212 (24)	12,134 (21)	58,925 (100)
	輸入	542 (4)	6,046 (43)	7,636 (53)	14,224 (100)
	總額	33,121 (45)	20,258 (28)	19,770 (27)	73,149 (100)
1944	輸出	36,657 (52)	15,771 (22)	18,096 (26)	70,524 (100)
	輸入	417 (1)	15,311 (46)	17,211 (53)	32,939 (100)
	總額	37,074 (36)	31,082 (30)	35,307 (34)	103,463 (100)

資料來源：1937-1939據《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昭和14年）》，頁2-7計算而得；1942-1944據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頁459-60計算而得（1940,1941無相關資料）。

第二是貿易額突飛猛進與貿易收支大幅改善，中日戰前臺灣與大陸地區貿易雖有起伏，大體上是呈現長期下跌的趨勢。<sup>127</sup>不過，從1939年起，對大陸地區的貿易額卻是急速增加，由前述表2觀察得知，1944年的貿易額是1937年的三倍多，對中國及滿洲的增加更為明顯。若分就輸出、入來看，中日戰前數年，大陸地區輸入便占了臺灣進口總額的65%以上，遙遙領先第三國；其後迄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此比率依舊不變，絕對值也幾乎與事變前相去不遠，顯然受到嚴密限制的第三國輸入，隨著軍需品及其他重要物資的輸入增加，並未見大幅減退。至於輸出則明顯逆轉，

127 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1月），頁14-18。

1937年以前，對大陸地區輸出皆少於第三國，當年不過占總輸出額的39.6%。但1938年起則急速增加到75%以上。事變後圓域輸出之所以顯著增加，雖由於需求增加，但與當地物價高漲，以及臺灣被迫採取日本的低物價政策亦有不可分的關係。臺灣的主要輸出品，如香蕉、砂糖、茶、橘子、海產等的價格，從1936到1939年，在對岸約上漲了70%，因而圓域輸出額的增加，應有相當程度是由於當地的物價上升，而非全然是實際的輸出增加。不過圓域輸出貿易在臺灣對外國貿易的比重高居不下則是不爭的事實。

由於輸入不變、輸出驟增，連帶使得臺灣對大陸地區的貿易收支情形改善不少。中日戰前對大陸地區整體貿易多為入超，特別是對關東州及滿洲國更是少有例外（參見表2）；相反地，第三國貿易則多半出超。但1939年則反轉，對大陸地區出超了3,300萬圓，第三國則入超117萬圓。最多的出超額甚至高達7,300萬圓，其中對中國的出超明顯增加乃為主因。不過正如前述，在國際收支上，同樣使用日圓的圓域貿易其實與內地貿易無多大差別，故其出超對於日本念茲在茲的國際收支平衡上並無多大助益；相反地，第三國貿易轉為入超，正意味著包含臺灣在內，整個日本帝國的貿易收支皆趨於惡化。<sup>128</sup>

第三是臺灣本地物產再度躍居輸出貿易品主流。事變前後，輸入商品內容變化不大，惟有奢侈品受限於輸入管制幾乎消失；肥料則在排除其他國家的輸入後，由東北持續獨占鰲頭。輸出方面，砂糖、米、包種茶、煤炭、鳳梨罐頭等本島產品成為輸出大陸地區的主要產品。

## 五、結 論

日本取得海外殖民地後，除了將其納入本國關稅圈外，在貨幣政策上，採取類似法國的「通貨共通主義」，將各殖民地以和日圓等值的通貨加以聯結，形成日圓集團，這種背景使得1930年代世界走向集團化傾向時，得以迅速形成圓域貿易圈，與英鎊、美元的貿易圈分庭抗禮。

---

128 田淵實，〈臺灣貿易の構成變化〉，《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頁611-616。

所謂的圓域貿易圈具有如下兩個特色。首先，其範圍與內涵，是隨著日本帝國的不斷膨脹而改變：1930年代初期進占中國東北，此時可名之為「日滿集團」；30年代末期華北、華中陸續納入，而有「日滿中集團」之呼聲；迄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歐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遭日本掠奪，遂改稱「大東亞共榮圈」。其次，「日滿中集團」時代的圓域貿易圈範圍，並不必然取決於日軍的軍事行動速度，一方面也有日軍整體戰略考量。至1938年底為止，華北、華中的大都市，及部分華南地區皆處在日本掌控之下，然而當華北在1938年至1939年間，透過稅款管理權的掠奪、稅則的修訂，乃至聯銀券的強勢推行、法幣流通的禁止而納入圓域區域時，華中方面即使已有一億以上的日圓流通，<sup>129</sup>卻依然被視為圓域圈外的地區，且遲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才加快腳步將華中整編完成。最主要的關鍵，即在當地的國際關係複雜，同時日本也想利用此地套取外匯。

圓域貿易圈擴大的進程，固然影響著兩岸間的貿易發展，但另一重要因素也不容忽略，此即日本的戰時經濟政策。德、義、日三國同盟締結以前，日本採取所謂的準戰時體制，一方面要確保軍需材料輸入，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國際收支平衡，所以必須儘可能獲取外匯，對同屬日圓流通地區的圓域貿易加以管制，毋寧是相當自然的思考。既已締結同盟，隨即進入戰時體制，前兩項目標固然仍存在，但也必須漸漸思索退路，生活必需品自給成了當務之急。尤其在美、英凍結日本資產後，獲取外幣無望，唯有務實加強本身所能主宰的圓域貿易，於是對圓域貿易採取積極提倡的作為，具體做法則有免除關稅、取消輸出品之國內稅、整編貿易法令等。

總之，由於日本整體貿易統制政策的轉向，以及圓域貿易圈的不斷擴大，兩岸間的貿易往來，不僅未因戰爭造成中斷，反而在中日戰爭後期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責任編輯：賴淑卿）

---

129 中井省三，《日本戰時貿易政策と輸出入リンク制度論》，頁24-25。

## 徵引書目

### （一）日文舊報紙與總督府財務局、稅關統計資料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明治29年至昭和17年。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官報》。臺北，昭和17年至20年。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貿易四十年表》。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昭和11年9月。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昭和14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昭和15年。

### （二）專書

#### 1. 中文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誌》。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59年6月。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第1版。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3年第1版。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82年10月4版。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民國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陳翰笙、千家駒主編，《一九三八年英日關於中國海關的非法協定》。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蔡渭洲，《中國海關簡史》。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臺北：故鄉出版社，1997年初版。

#### 2. 日文

山本有造，《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2月初版第1刷。



中井省三，《日本戰時貿易政策と輸出入リンク制度論》。東京：千倉書房，昭和14年5版。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昭和16年版）。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7月2刷。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12月臺北2刷。

平尾彌五郎，《最近の貿易及貿易政策》。東京：一元社，昭和12年初版。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局，1988年6月第1刷。

酒井澤喜，《日本貿易統制機構》。東京：修文館，昭和17年初版。

植田捷雄，《東洋外交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9月初版。

堀和生，《東アジア資本主義史論I—形成・構造・展開》。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年9月初版第1刷。

### （三）期刊論文

#### 1. 中文

林滿紅，〈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一日本領臺為兩岸長程關係投下的變數〉，《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1刷），頁271-353。

林滿紅，〈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頁653-696。

林美莉，〈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年6月。

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1月。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福建政策〉，收入於《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頁37-61。

#### 2. 日文

三浦弘一，〈臺滿經濟提攜の基調と方向〉，《臺灣時報》，第235號（昭和14年6月），頁30-39。

- 山口一夫，〈事變下臺灣に於ける物資統制〉，收入於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  
《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昭和16年版）（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7月2  
刷），頁569-598。
- 水津彌吉，〈本島内外の經濟情勢に就て〉，《臺灣時報》，第262號（昭和16年  
10月），頁16-23。
- 水津彌吉，〈大東亞戰爭下の臺灣金融情勢—昭和十六年度下半期株主總會に於  
て〉，《臺灣時報》，第268號（昭和17年4月），頁32-36。
- 水津彌吉，〈東亞の經濟、臺灣の經濟〉，《臺灣時報》，第274號（昭和17年10  
月），頁48-55。
- 太田修吉，〈事變と臺灣對内外貿易の現狀及將來〉，《臺灣時報》，第221號  
（昭和13年4月），頁60-69。
- 中島一郎（總督府財務局長），〈外國人取引取締規則公布に就て〉，《臺灣時  
報》，第261號（昭和16年9月），頁3-4。
- 田中國一（殖產局商工課），〈最近の貿易統制の行き方に就て〉，收入於《臺  
灣經濟法令講座》，第三輯（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昭和16年），頁138-  
160。
- 田淵實，〈臺灣貿易の構成變化〉，收入於《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昭和16年  
版）（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7月2刷），頁599-626。
- 田淵實、大浦賢，〈臺灣貿易の統制〉，收入於《臺灣經濟年報》，第二輯（昭和  
17年版）（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7月2刷），頁235-258。
- 青木武司，〈事變下の臺灣貿易と産業〉，《臺灣時報》，第232號（昭和14年3  
月），頁28-41。
- 林益謙，〈轉換期臺灣の新思路〉，《臺灣時報》，第236號（昭和14年7月），頁  
2-16。
- 岸澤東一，〈貿易構成に觀る臺滿關係〉，《臺灣時報》，第236號（昭和14年7、  
8月），頁24-25。
- 後藤清，〈統制經濟確保のための新立法—貿易調整法、貿易組合法、工業組合  
法中改正法の解説〉，《法律時報》，第9卷第9號（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



12年），頁13-16。

堀和生，〈植民地帝国日本の經濟構造——一九三〇年代を中心に一〉，《日本史研究》，第462號（2001年2月），頁26-54。

滿尾元志，〈昭和十四年の臺灣貿易狀況〉，《臺灣時報》，第242號（昭和15年2月），頁53。

臺灣銀行調查課，〈貿易〉，收入於《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昭和16年版）（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7月2刷），頁283-292。

維摩居士，〈臺灣貿易會の諸課題〉，《臺灣時報》，第281號（昭和18年5月），頁40-45。

橫田道三，〈長期戰下の貿易問題と臺灣輸出貿易對策〉，《臺灣時報》，第226號（昭和13年9月），頁38。

藪下晴治（總督府外事部事務官），〈臺灣の戰時交易統制概要〉，《臺灣時報》，第294號（昭和19年7月），頁19-29。

#### （四）臺灣時報未署名彙報（按時間順序排列）

「臺灣茶貿易に關し 滿洲國と假調印」，《臺灣時報》，第249號（昭和15年9月），頁188-189。

「圓域交流物資統制に付き殖産局長談」，《臺灣時報》，第251號（昭和15年11月），頁175-176。

〈本年度輸出糖約為去年度一半〉，《臺灣時報》，第252號（昭和15年12月），頁156-157。

#### （五）其他

武田晴人，〈現代日本經濟史12〉，收入於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經濟學部網站，網址：<http://www.e.u-tokyo.ac.jp/~takeda/gyoseki/GAKU00-12.htm>。

國史館館刊 第25期